

略论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形式中的社会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之路径

邓小林¹ 范曾丽²

(1.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2.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9)

【内容摘要】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是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而逐渐展开的,其办学形式与数量等也在抗战中不断完善与提高,在其具体的办学实践中,尤其是教材选择与教学方法等方面,体现着十分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实现路径,在其实现大众化的过程中,所有的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 小学教育 社会教育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G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5-0162-04

一、陕甘宁边区小学设置及发展概况

自抗战爆发以后,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就开始紧密配合着抗战动员而展开。正如1938年3月6日,边区教育厅发出的通告中说到,“适应着战时的环境和需要,更具体更紧张地把应教的课应做的工作推动起来,这样才能和群众的抗战运动与儿童的战时活动取得密切的联系”^{[1](P1)}。

在一切为了抗战需要的原则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注意从法律制度上规范小学教育。1938年8月15日,边区教育厅公布了《小学法》,明确规定,“边区小学应依照国防教育方针及实施方法以发展儿童的身心,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及抗战建国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技能”,而修业期限为五年,“前三年为初级小学,后二年为高级小学,合称为完全小学,初级小学得单独设立”^{[1](P11)}。这说明,就小学的办学形式而言,初级小学与完全小学是最基本的两种形式。不过,如果完全小学或初级小学办理完善的,得呈报为模范小学,模范小学的条例则由边区教育厅另行单独规定。其实即在同日,边区教育厅就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建立模范小学暂行条例》,并明确规定“模范小学必须以其优良质量,对其他小学起推动作用,树立小学教育中的国防教育的模范”为首要条件才能具备资格^{[1](P14)},此后,又规定了模范小学必须达到的一系列最低限度的标准。除这三种小学形式外,《小学法》又同时规定,“师范学校和中学校附设的小学为师范学校或中学校附属小学”^{[1](P11)}。

之后,随着小学教育形势的发展,关于小学之设置形式,更加灵活了。如1941年2月1日,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实施纲要》,其第二条规定,“小学校以男女合校为原则,遇必要时得单独成立女子小学校。”^{[1](P97)}

1944年8月13日,绥德分区文教会议还专门探讨了米脂女小积极参加劳军优抗的工作。在女小参加慰劳军队的工作后,军队政治部的同志还感叹地说道,“想不到这么多十七八岁的姑娘,敢给军队补衣服”,而且自这以后,“战士同志也自动的拿出衣服来,大家像一家人。”^{[1](P189)}到了1944年,更是出现了民办小学。据该年4月7日《解放日报》记载,“延市西区两个新创立的新型学校——裴庄小学和莫家湾小学,已于三月二十八日在裴庄联合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学。”而这两个新型小学,其性质就是“民办小学”,而这两个小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学校系老百姓自办”,老百姓“自己设法解决了校舍、锅灶及其他用具等,并且还调剂了两亩地给学校做农场”^[2]。这种“民办小学”后来又逐渐演变成“民办公助”形式。1944年7月,米脂县召开文教会议并总结民办小学经验时说道,“民丰区姜兴庄中心小学和卧羊区的中心小学,现在正准备化整为零,由完全公办转变到民办公助,把中心小学分散到各乡村”^[3]。据上论述可见,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至少大约有七种形式。

随着小学办学形式的多样化,小学学校数目与小学生数也逐渐增加起来。

总体上看,从1937年春天开始,到1940年秋天,边区小学的学校数目虽然略有停顿,如1940年春和1940年秋的小学校数目是一样的,都是1341所,但是小学生数目还是稳步增长的,即总趋势是逐步稳步增长的,这可从下表略见其概。

年代 学校 学生 (数目)	年代							
	1937 年春	1937 年秋	1938 年春	1938 年秋	1939 年春	1939 年秋	1940 年春	1940 年秋

* 本文为笔者承担西南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信仰建立与路径选择:延安时期教育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研究”(英文标注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编号 SWJTU11CX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邓小林(1972—),男,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小学数校	320	545	705	733	890	993	1341	1341
学生数	5600	10396	13799	15348	20401	23089	41458	43625

表一 1937年春至1940年秋边区小学概况表

资料来源:陈元晖主编,璩鑫圭、邹光威编写:《老解放区教育简史》[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104。

需特别说明的是,上表中1938年春学生数目“13799”这个数字,是笔者对照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内容改定过来的^{[1]P119},在《老解放区教育简史》中原作“19799”。

这种稳步增长,是与边区政府的政策导向密不可分的。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通过了《关于扩大与改进小学的决议》,依照决议内容,“各县可以按照本县情形,酌量增加若干”^{[1]P19}。并具体规定了1938年下半年即秋季入学时各县应扩大的初级小学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延长县为8所,120人;延安县为5所,200人;环县为5所,120人;新正县为6所,300人;固临县为2所,100人;甘泉县为5所,100人;华池县为5所,100人;淳耀县为5所,200人;志丹县为3所,100人;靖边县为2所,60人;定边县为5所,200人;神府县为9所,140人;安塞县为2所,120人;安定县为2所,70人;盐池县为2所,80人;宁县为6所,200人;延川县为5所,400人;曲子县为3所,100人;赤水县为4所,900人;总计82所,共计学生3610人。此外还规定在延长县、新正县、淳耀县、神府县、宁县这五县每县设立一所完全小学^{[1]P2-3}。

上表中1940年春天到1940年秋天学校数目没有增加,原因在于经过1937年春到1940年春三年时间的发展,边区政府已经意识到不能单纯的依靠增加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来“提高”小学质量了。

二、小学教育形式中的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学校教育,二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包括的课程比较多,如文化、政治、唱歌、画画等课程;社会教育则针对性比较强,主要是为了抗战的需要而进行的一些教育活动。在这些社会教育内容中,体现了非常明显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等学说。

早在1938年3月6日,边区教育厅发出通告,提出抗战时期小学应该注意的几个工作时即指出,“在抗战紧张时期,课外活动更须提到最高度。第一,小学应积极参加每个抗战动员工作的布置(如目前的反托匪、锄奸工作及战时的春耕动员),特别是战争形势的报告,小学应负很大的责任,利用早晚农民休息的时间报告(如读报等),必须使学校周围的村庄,都了解目前抗战形势。第二,每个小学除学生参加当地少先队外,教员应该做自卫军、少先队的文化政治教员,经常地去给他们教字或政治课,以提高战时民众的文化政治水平。第三,群众教育,运用小先生的办法,领导附近的群众识字工作,并实行每周检查,以提高农民识字的热忱。第四,每礼拜六全体学生要实行优待抗属,以慰劳他们。第五,春耕的配备,学校应负动员的责任,同时每校亦可种瓜菜一二亩,以解决教师和学生的生活问题。总之,要把课外

活动的工作更紧张起来,以配合抗战动员。”^{[1]P60}到1939年8月5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颁布的《边区小学规程》中第二十六条再次明确规定,“社会活动包括下列各项:①抗战宣传及一般改良社会宣传。②优待抗属、帮助自卫军放哨、锄奸及其他抗战动员工作。③领导识字组、夜校、半日校”^{[1]P19-20},这与前述内容的核心是一致的。这说明小学教育中的社会教育内容是十分明确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

从上述内容来看,这些小学教育中的社会教育内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如学开路条、写信、记账、珠算等,群众也非常高兴。而一些与抗战等关系密切的社会教育内容,更是受到特别的重视,如1944年3月24日延安教育界在纪念生活教育运动第十七周年时便总结到,“去年的防奸大会、劳动英雄大会、反二流子大会以及今年的秧歌队活动,都是很大的社会教育”^[4]。这些社会教育内容一方面体现着十分明显的思想政治教育性;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等学说的大众化。

1938年2月27日,柯柏年曾写《边区的学校教育》一文,在文中他除了总结了边区的学校教育外,还总结了社会教育,作者说道,“你如想知道学生在课余时间做的是什么事,你尽可问他,他会告诉你:‘礼拜六,教员带我们去替抗日人家属挑水、砍柴。我们还组织锄奸团,侦察汉奸托派的行动。政府征收救国公粮的时候,我们就去帮政府宣传劝募。山西败退过来的脱离了队伍的散兵,我们去慰劳他们,宣传他们‘归队’。为要慰劳前方抗战的战士,我们就去劝募慰劳的物品’”,而且作者评论道,“你听了这些话,不得不把你从前的‘小孩子能做什么救国工作’的谬误的观念取消了,你现在知道了只要有适当的指导,小孩子是能够做许多的救亡实际工作。小学生还是救亡运动的一支生力军。”^[5]换言之,通过教育学习,到自觉自发,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

1938年11月16日,时任边区教育厅代厅长的周扬在改进与扩大小学工作初次总检查的总结会上,对于一些地方不重视小学生的社会教育现象也批评道,一些地方“课外活动还不普遍。当然各地情形不同,我们应根据情况进行。如有在岗哨的地方,可以帮助放哨盘查,有抗日人家属的地方,进行优待工作,识字组的工作必须普遍进行广泛的抗战宣传和政府每个时期的各种动员工作,也是每校必须执行的。”由于冬学形式是小学社会教育中主要的形式之一,因此,周扬同时还强调,“最后一点,就是各处小学对课外活动大半有冷热性。目前冬学开始了,各小学都应组织动员小组,分工动员,扩大冬学,把小学的扩大数量和提高质量工作与冬学运动联系起来。”^{[1]P123}这说明,抗战宣传与动员等内容确实是小学教育的中心内容,在抗战宣传与动员的过程中,小学生不仅学习了简单的马列知识,而且也使自己在过程中逐步地成长与成熟起来,变成了坚定的民族自卫与自强者之一。此外,周扬的总结还表明,其实从1938年冬开始,边区政府已看到了小学教育发展中的不正常现象,这也与上述内容是一致的。

由于社会教育内容的目的性与针对性都很强,在教学的过程中,从教材选择到教学方法等,都采取了较为灵活的

方式,也体现十分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了比较令人满意的成绩。

其一,关于教材。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在革命战争年代,教材是十分缺乏的。就学校教育使用的教材来看,从1937年秋季起,到1940年秋天,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一共编印了初级小学使用的教材九种,其中国语、常识、算术各两种,劳作、图画、唱歌各一种,这九种教材一共二十九册,每册印的本数最多是一万册。另外还编印了高级小学使用的教材和补充读物一共九种,其中国语、历史、地理、自然、政治各一种,算术两种,国语补充教材两种,这九种教材一共是二十册,每册印了一千到一千五百册。而社会教育课本及其补充教材,一共也只有十一种,共一十五册。对于教材匮乏状况,1940年7月,安定县专文报告说,“书本太缺乏,有的学校六七个学生合读一本书,还有连一本书也没有,全是教员抄的,重念或越册的现象有时也在发生。”^{[1]P41}针对这种情况,在选择教材时就采取了灵活的方式方法,如把“政府的法令、政策当作课程来教,使每个学生对于革命三民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有个清楚的认识,并随时帮助政府推动工作,使学生毕业后,就可以成为政权工作的成熟干部。”^[6]而有的地方,教材缺乏,他们采取《新中华报》、《边区教师》一般的标语口号来作补充教材。但是这也不是说每个地方或者每个小学都能够有这样的积极性或者自觉性,如“有少数小学在这方面作得很差,他们借口教育厅的教材很少,群众的要求,自己又无能力编制选择,就放弃国防教育的原则,作群众的尾巴,采用不适合抗战内容的教材,如过去的共和新国文,新学制的国语、常识等”作小学社会教育的教材^{[1]P48}。这在当时不仅是不适合的,也是遭到了严厉批评的。这些被选用的教材,其内容与程度,都是与抗战宣传与动员和小学生的年龄十分吻合的,一方面达到了学习与宣传马列主义,另一方面又取得了大众化的目的。

其二,关于教学方法。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在扩大与改进小学的决议中已明确指出,“要运用国防教育的教学方法(就是在暑假期研究班所学的那些教学法),应实行集体的教学,指导学生集体的学习,自动的学习,举行集体的竞赛,提高学习的情绪”,同时“要彻底废除打骂的传统教育方式”^{[1]P18}。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小学教育中的社会教育方法逐渐改变了过去落后的不切实际的教育方式,而采用了比较灵活的更符合抗战实际需要的教育方法。1944年3月21日,延安市区的完小在总结工作经验时曾说道,除了学校教育以外,“同时又进行社会教育,这两项也联系得很好。今春拥军拥政爱民运动中,完小学生把拥军、拥政爱民的道理,给他们家长传说。此外学校又以生产、拥军、防奸为内容编成秧歌剧,到外去宣传,给了市民很到的教育。”^[7]从学习到宣传,这就是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稍后,在“纪念生活教育运动第十七周年——延安教育界暨各分区专员座谈边区国民教育确定普通小学的民办公助”的会议上,一位姓张的专员谈到当时关中分区小学的社会教育情形时说道,“谈到社会教育,四三年关中有两件新的东西:第一,社会教育和群众生产结合,如庙湾唐将班子休息时由书班读报,读本班子的新闻,大大提高了群众的

生产情绪和政治认识。第二,八一剧团的活动,对群众的教育作用极大。马栏二乡的一个农民看了剧团的一部叫关中四杰的戏,回去就努力组织了唐将班子,并且去找县上的同志说:‘请你也把我编在戏里吧!’白原村有一个二流子,转变得不算很好,只计划开八亩地,剧团把他的事编在戏里,但把他写得比较好些,他看后回去就把自己的计划改为二十八亩,说:‘再不多开荒,不但对不起政府,也对不起剧团!’”其实,这就是针对各地不同情况而采取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教育方法。与此同时,延安市在总结小学教育中的社会教育时一位姓马的市长也说道,“社会教育方面,民教馆的夜学有一个新的创造:由商人及商会等出来任教员,教给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如学开路条、写信、记账、珠算等,群众非常高兴。此外,去年的防奸大会、劳动英雄大会、反二流子大会以及今年的秧歌队活动,都是很大的社会教育。枣园的变工队今年完成最早,上山也最早,就是因为有了秧歌队演×××村里动员起来的故事,群众说:‘×家枣园也是一个枣园,咱们也是一个枣园,为啥能落后?’”^[8]这也是适合延安小学教育的社会教育方式。总体来看,在小学教育形式的社会教育中,其教学方法一是体现了灵活性,这主要是因地制宜;二是体现了普遍性,“一般的教学方式采用启发式:启发、参观、实习、实验、讨论、漫谈、互助、竞赛,在学校可能条件,均可活用。”^[8]

三、经验与教训

延安时期小学教育形式中的社会教育,因为其处于整个教育环节中的义务教育阶段,同时又因为处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个特殊的时期,其采取的方式方法与取得的成就等,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虽然是小学教育中的社会教育,教育受众是小学生,但是,他们也是抗战建国的一份子,更象征着未来。他们经过学习、理解,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化吸收了所学到的马列知识,最终还将它运用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了。而这些知识,通过各种比较灵活与容易被孩子们接受的方式,来达到社会教育的目的。如在具体教学时,可以将一些大道理编成长短句,孩子们容易理解。如“延安市马市长,他的名字叫豫章”,读起来就简单好记。在如,“毛主席,是太阳,晒的老百姓暖洋洋”^{[1]P209},也很容易使小学生记住毛主席这个伟大人物。我们过去所学习或者曾经读到过的故事,如“儿童捉汉奸”、“王二小”、“鸡毛信”等等,就更真切反映了儿童也能够成为抗战的一支力量。其实,在小学教育形式的社会教育中,最主要的还是孩子们学习了马列知识以后,如何实现“化”这个过程。如大家十分熟悉的儿童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儿童团里,“儿童们有的过着组织生活,而且有着充实的组织生活的内容。他们经常(多半是七天)的开小队会议,讨论些简单的抗战形势,以及军事演习、上操、打球、游戏、唱歌等问题。他们的游戏更是充满了抗日的意味,如捉汉奸、送信、打骑兵、运输、捉侦探等”^[9],这说明儿童们已经在实现自我转变了。不过,同时还应该注意,正因为是小学教育形式中的社会教育,所以,必须遵循小学教育的规律,而不能超越小学教育这个阶段,在看到孩子们是未来的同时,也要注意他们的实

际年龄 过于深刻的内容 小学生们还是不能够理解的。这表明,“进行思想教育应根据儿童的特点与认识程度,运用循循善诱、耐心说服、民主检讨等方式 逐渐提高,反对机械的搬用教育成年人的方法教育儿童。”^{[1][P273]}

其次 小学教育中的社会教育内容 主要是为了抗日的需要,因此,该时所采取的教学方法普遍为小学生们所接受,这一点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学习与借鉴。如上述的启发式、实习式、讨论式等等。另外,在如何组织小学生进行社会教育 组织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成立民教馆、阅报室、民众娱乐社、夜校、冬学等等。

最后 延安时期小学教育中的社会教育,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也出现了重量不重质、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等弊病。全面抗战开始后约半年,1938年初,边区政府就曾指出了这样的缺点。一些“识字组、夜校、半日班等等,大都徒有形式,毫无内容”,并指出“今后社教工作,应注重于整理与充实。但是这任务可以说在今天并没有完成,仍旧是大而空

洞的数目字,仍旧是没有内容。在盐池县,竟连空洞的数目字也没有,根本就没有社会教育这事。”^{[1][P60]}那么,当下现实生活中的我们的小学教育,又有没有类此状况呢?答案是肯定的。

参考文献:

- [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M](小学教育部分)(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 [2]解放日报[N].1944.4.7.
- [3]解放日报[N].1944.7.15.
- [4]解放日报[N].1944.3.24.
- [5]战时教育[N].1938.4.5.
- [6]解放日报[N].1944.3.31.
- [7]解放日报[N].1944.3.21.
- [8]新华日报[N].1944.6.3.
- [9]新华日报[N].1939.1.4.

(上接第136页)国家利益。如果当时苏联并未在古巴部署进攻型导弹,并不代表核大战的威胁就会消失。不在古巴部署,难道就不会在别的地方吗?

5.证据在哪里?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永远的秘密。即使苏联人拼命地在国际上做足姿态,表示不会在古巴部署进攻型导弹,扰乱美国视线,但是还是会有线索显现出来。当“鄂木斯克”号货船静静地停在港口时,间谍就将“不对劲”——庞然大物的尺寸上报给上级。当情报传递至上级手中时,情报分析人员却将其视为间谍的粗心,白白错过了解决威胁的最佳时机。

6.我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每个情报分析人员在分析掌握的情报时,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政府和情报分析人员的判断前提就是苏联不会在古巴部署进攻型导弹。而正是这个极其局限的评判标准,使得美国情报人员一步错,最终导致步步错,让美国政府在此次危机中处于危急地位。虽然最后美国先发制人,在最后的谈判上掌握了主动,但是在之前千钧一发的时刻,也差点让世界陪葬。反之,如若美国政府和情报界对其评判标准进行修改,或者设立不同层次的判断准则,或许在分析情报上,会有所警觉,不至于造成严重后果。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在分析情报时,多问自己“为什么”,多做几种假设,多从不同层面上分析,得到的结

果肯定有差别。情报分析人员应该经常变换自己的思维方式,运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情报。

四、总结

批判性思维是近几年讨论的热门话题。不论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将批判性思维方式引入自身学科。情报分析作为一门兼具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双重属性的学科,自然也不例外。情报分析人员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思维方式决定着情报产品质量的高低,情报产品质量的高低又决定着决策者能否做出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又决定着人民的生命、战争的胜负和国家的利益。因此,加强情报分析人员的思维训练是一项长期的极其重要,而又非常艰巨的工作。将批判性思维应用于解决情报分析人员长期的固有思维模式中,削弱固有思维模式的影响,强化批判性思维,十分有助于提高情报分析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所生产的情报产品的质量。

参考文献:

- [1]张晓军.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M].时事出版社.
- [2]李庆艳.批判性思维特质研究综述[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
- [3]张晓芒.批判性思维及其精神[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4]孙守鹏.情报与决策到底是谁的失误[J].情报探索.
- [5]刘新华,秦仪.威胁认知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错误知觉[J].现代国际关系.